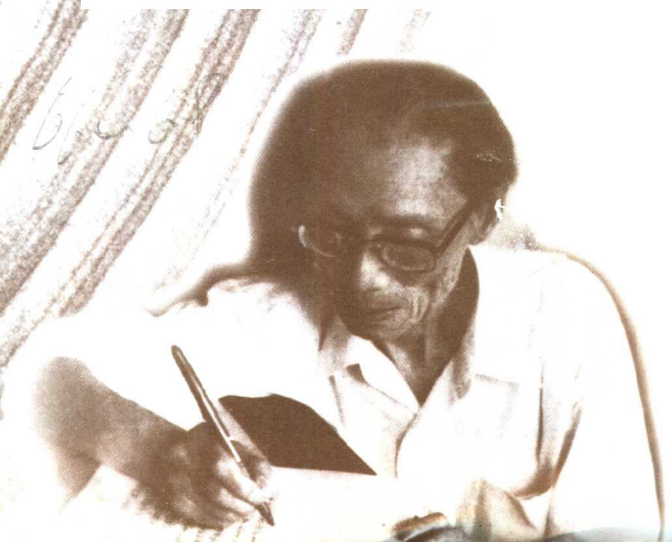


# 夏衍自传

名人自传丛书



## 夏衍自传

---

作 者:夏 衍

责任编辑:郭济访 章俊弟

---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阴新华印刷厂

---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5 插页6

字数:200,000 199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

标准书号:ISBN 7—5399—1005—4/I·955

定 价:13.00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916年 夏衍(16岁)  
在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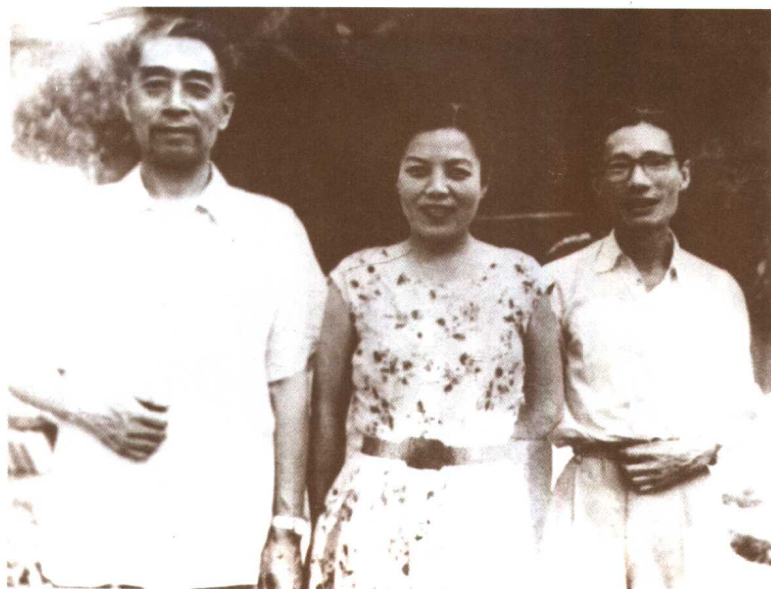
幼年夏衍与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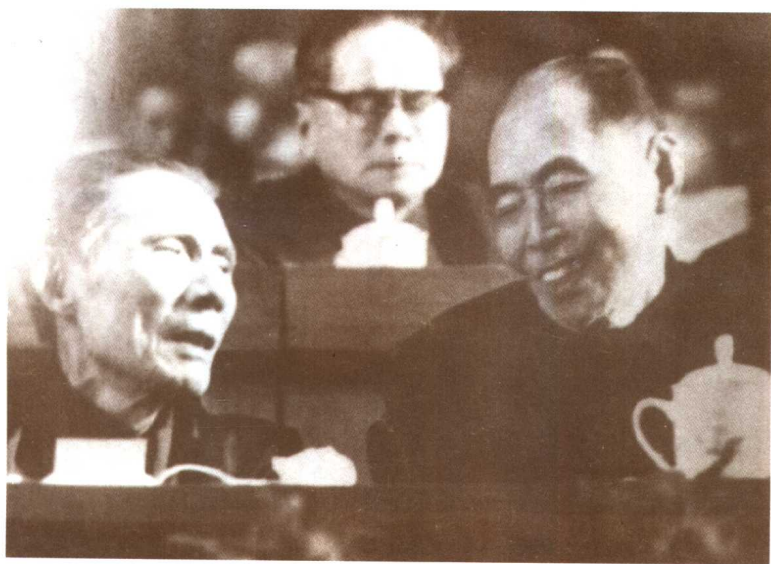
青年夏衍在日本

1956年 夏衍与《祝福》  
剧组





1963年 夏衍与周恩来  
1979年 夏衍与茅盾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







1984年 夏衍与邓小平

1991年 夏衍与江泽民





## 目 录

- 1 第一章 启蒙
  - 1 一、家世与童年
  - 5 二、开蒙三易校
  - 10 三、“甲工”新天地
  - 14 四、“五四”迎风暴
  - 19 五、保送赴东瀛
- 22 第二章 寻求
  - 22 一、“明专”求索急
  - 29 二、谒见孙中山
  - 32 三、毕业就新任
- 35 第三章 搏击
  - 35 一、参加共产党



## 目 录

- 38 二、译书以糊口
- 41 三、奉命筹“左联”
- 47 四、参与新戏剧
- 55 五、进入电影界
- 68 六、“左联”的后期
- 74 七、重建新“文委”
- 77 八、萧三来信后
- 83 九、“口号”之论争
- 89 十、在大悲哀里
  
- 92 第四章 抗争
- 92 一、西安惊事变
- 98 二、“七七”芦沟桥





## 目 录

- 106 三、郭沫若回国
- 117 四、沪《救亡日报》
- 121 五、穗《救亡日报》
- 125 六、桂《救亡日报》
- 138 七、香港《华商报》(上)
- 142 八、渝《新华日报》
  
- 180 第五章 光明
- 180 一、沪《建国日报》
- 192 二、香港《华商报》(下)
  
- 197 第六章 耕耘
- 197 一、北平到上海
- 245 二、上海到北京



## 目 录

- 274 第七章 折肢  
274 一、高墙里的梦  
277 二、迟到的春天
- 280 第八章 奉献  
280 一、要忧国忧民  
283 二、为电影诊病  
298 三、谈经验教训  
305 四、为自己“揭秘”
- 322 第九章 尾声  
322 一、发生命之光  
325 二、忆儿时旧梦  
327 三、妥办身后事
- 330 后记

# 第一章 启蒙



## 一、家世与童年

一九〇〇年，庚子，清光绪二十六年，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年头。这一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也是这一年，孙中山在香港被选为兴中会总会长。就在这一年的旧历九月八日（公历十月三十日，这一年是闰八月），我出生在浙江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的一个号称书香门第的破落地主家庭。据“家谱”记载，我们这一家祖籍河南开封，是宋室南迁时移居到临安的“义民”。但是，南迁到杭州后能够在战乱中安下家来，又能在城里城外都置了房产，并和官宦人家结了亲缘，特别是我家的堂名叫“八咏堂”，因此我想，叫“义民”可能有点夸张，说“义官”也许比较恰当。浙江杭嘉湖一带姓沈的很多，大概是一个大族。可是到了我祖父那一代，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家道日益衰落，只是在离杭州城三四里的严家弄，还有一幢用风火墙围着的五开间七进深的

大而无当的旧屋。

我懂事的时候，我家已经衰落了，全家人不到十口，但是这一百年前造的屋子，说得并不夸张，可以住三百人以上；经过了太平天国之乱，许多雕花的窗棂之类都破损了，但是合抱的大圆柱，可以做一个网球场的大天井，依旧夸示着它旧时的面貌。我在这破旧而大到不得体的旧家，度过了十九个年头。辛亥革命之后，我大哥为了穷困，几次想把这屋卖掉，但那时却找不到一个能够买下这大屋子的买主。大哥瞒了母亲，从城里带了一个人来估看，我只听到他们在讨价还价，一会儿笑一会儿争之后，大哥愤愤地说：“单卖这几千块尺半方的大方砖，和五百几十块青石板，也非三千块不可！”这时我才知道，这些我日常在那里翻掘起来捉灰鳖虫的方砖，也还是值钱的东西。据母亲说，这屋子是我们祖上全盛时期在乡下造而不用别的别墅，本家住在艮山门内骆驼桥，只是每年春秋两季下乡上祖坟时临时使用的住处。出太平门两三里，就可以望到这座大屋的高墙，那高得可怕的粉墙，里面住的是“书香子弟”，和外面矮屋子里的老百姓分开，附近老百姓就把沈家叫做“墙里”。

辛亥革命前后，我家衰落到无法生存的田地，这屋子周围的田地池塘，都渐渐给大哥典卖了，只有这屋子，却因为母亲的反对，而保留着它像破旧的古庙般的面貌。夏天的黄昏，会从蛀烂了的空楼里飞出成千上万只白蚁，没有人住的空房子里，白天也可以看到黄鼠狼和狐狸。……

我的祖父沈文远，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曾被太平军“俘走”，因为他读过书，所以后来就当了陈玉成的记室（秘书），直到陈玉成在安徽寿州战败，陈才派一个“小把戏”（小鬼）陪送他回到杭州。由于这个缘故，他未曾应试，没有功名。祖母余杭章氏，是章太炎的堂房姊妹，据我母亲和姑母们说，她是一个非常能干而又十分严厉的人。我的父亲沈学诗，字雅言，是一个不第

秀才，没有考中举人，就退而学医，给附近的农民治病。据说他的医道颇好，但是他在我出世后第三年，一九〇三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在祭祖上香的时候，一跪下去就中风而去世了，终年四十八岁。母亲徐绣笙，德清人，我们兄弟姊妹共八人，除了两个早逝外，一个哥哥，四个姊姊和我，都是靠她一个人抚养成长的。她识字不多，但是通情达理，宽厚待人。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我的长兄沈乃雍（霞轩），十四岁就到德清的一家叫“长发当”的当铺去当了学徒。祖传的二、三十亩旱地，在父亲去世前后就陆续典卖了大半。一家七口，除了老房子沿街的两间小平房出租，有几块钱的房租，和每年养一、两季春蚕有一点收入之外，主要得靠我舅父和两个姑母的周济。舅父徐士骏，是德清的一位绅士、地主兼工商业者。我的大姑母适樊家，住在杭州城里斗富三桥，二姑母适李家，住羊坝头后市街。他们两家的上一辈都当过不小的官。这三家亲戚都比较富裕，因此过年过节都给我家一点资助。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从小穿的衣服，乃至鞋袜，都是樊、李两家表兄们穿过的“剩余物资”。我母亲对这些周济是感激的，但是每当她带着我和姊姊们到樊、李两家去拜年的时候，总要事先告诫我，不准向表兄表姐们要东西，他们给用的或吃的东西，除非得到她的同意，决不准接受。有一次我的表兄李学灏（幼甫，民族音乐研究家李元庆的叔父）送给我两支毛笔，和一个很精致的白铜墨盒，母亲就只让我收了毛笔，把墨盒退回，说我还不到用这种“好东西”的时候。我当时真有点舍不得，这种神情给母亲察觉到了，回家后就给训了一顿。到我五、六岁的时候，家境更艰难了，母亲忍痛把我的三姐（芷官）“送”给了住在苏州的四叔。为了减轻负担，又把大姐（荷官）嫁给我舅父的长子徐梦兰作了“填房”。大闺女给人作“填房”，在当时，似乎是不大光彩的，徐家是六房同居的大家庭，幸亏沈、徐两家是至亲，我舅父徐士骏又是一个有

绝对权威的家长，所以在妯娌之间还没有受到歧视。家里穷，又没有劳动力，只能把剩下的十来亩旱地租给别人种。二姐和四姐，还靠“磨锡箔”之类的零活来补贴家用。可是在严家弄这个小地方，我们这一家还是被看作“大户”，但那时候的乡下人都说，“墙里大不如前了”，“过年连供品也买不起了”，尽管这样，我母亲还是受到村里人的尊敬。

母亲欢喜看戏和听书，每逢“水路班子”、或者“绍兴大班”到乡下来演出，她一定要四姐和我背着条凳先去占好位置，陪她去看戏，而且一直要看到最后一出戏为止。她很懂戏，草台班子演戏，观众事先不知道演的是什么，可是角色一上场，她就会告诉我们：这是《龙虎斗》，这是《五鼠闹东京》等等。有一次看了一出叫做“长毛戏”的《铁公鸡》，回家后她就和我们讲了许多“长毛”（太平军）故事，如“四眼狗”（英王陈玉成）大破江南大营；特别是陈玉成如何信任我的祖父，以及在寿州战败后，给了我祖父一锭银子，遣送他回乡的故事。她非常熟悉《玉钗缘》、《天雨花》这一类故事，这大概是我父亲生前念给她听的吧。

母亲是养蚕的能手，每年都要养一次“头蚕”和一次“二蚕”。在我八岁进城上小学之前，每年要养三、四张蚕纸，劳力不够，得请短工帮忙采桑叶。我从五、六岁起就是一个辅助劳动力，所以从“掸蚁”一直到蚕宝宝“上山”，这一整套旧式养蚕工序，我都会做。因此，后来我改编茅盾的《春蚕》时，在明星公司的摄影棚里，我是唯一懂得养蚕的“技术顾问”。老鼠是蚕的大敌，为了防鼠，就得养猫，因此我母亲特别爱猫，并把这一癖好传给了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有一只和我同年出生的黄白猫睡在我的被窝里。为了喂猫，我常常到陈家荡去钓鱼，大概是六岁那一年，钓鱼时失足落水，差一点淹死。



## 二、开蒙三易校

我是母亲最后的一个儿子，我前面又是四个姊姊，这样，母亲宠我是难免的。大姊出嫁，三姊送出之后，能管我的只是比我大十二岁的二姊。兄弟姊妹中，她和我感情特别好，因此，对我的顽皮胡闹，例如钓鱼掉进水里、捉蟋蟀被蜈蚣咬肿了手指之类，她总给我“打掩护”，不让母亲知道。到六岁那年，一次我和几个“野孩子”打架，杨裁缝的儿子阿四向我母亲告了状，这才使我母亲想起了我读书的问题。

于是就决定让我到陈先生的私塾去“破蒙”。这私塾设在一家叫“邬家店”的后进一间小屋里，只有三张板桌，几条板凳，先生也坐在一张骨牌凳上，前面用一个破旧的柜子当作书案。当然，书案上也还有一块“戒尺”，不打人，只作为“惊堂木”之用，有时候拍一下，让顽童们安静下来。入塾的那一天，母亲陪我到邬家店买了一包点心，用红纸包了一块“鹰洋”，作为孝敬先生的“束修”，然后要我向陈先生叩了头，先生叫我坐在靠近他那个破柜子的长条凳上，这样，入塾“仪式”就完成了。第一本读的书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等等，当然还要“描红”，学写字。同学连我在内只有六、七个，我一个也不认识，后来知道，住在严家弄的只有我一个，其余大部分是华家池或新塘镇来的。大概因为我是“墙里人”，陈老师对我比较客气，我在这私塾耽了一年，好像没有挨过板子。《三字经》之后，我还读了《论语》。

我八岁那一年正月，母亲带我到樊家去拜年，当大姑母知道我在邬家店的私塾读书，就严肃地对我母亲说，这不行，沈家是

书香门第，霞轩（我大哥）从小当了学徒，可惜了；又指着我说，这孩子很聪明，别耽误了他，让他到城里进学堂，学费、膳费都归我管，可以“住堂”（住在学校里），礼拜日可以回家。大姑母主动提出，母亲当然很高兴地同意了。这一年春季，我进了“正蒙小学”，这是一家当时的所谓“新式学堂”，但是功课并不新。我插班进二年级。一年级学生念的依旧是《三字经》，不过这种新的《三字经》已经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今天下，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南北美，与非洲……”了。二年级念的依旧是《论语》、《孟子》，只是加了新的功课，一门是算术，珠算、笔算同时教，一门是体操，另一门是“修身”，内容我记不起了，从“修身”这两个字判断，大概是当时的思想道德课吧。这学堂有五六十个学生，二年级大约有十五个，我个子小，体操排队我排在最后，但讲功课，算术和语文我的成绩还不错。国文除教《论语》外，还要“对课”，从对两个字、三个字到对五个字，我因为在家已经看过一些父亲留下的书，似懂非懂地念过唐诗、唱本，所以对课这一门我成绩不错，特别是有一次老师出了个题“福桔”，我很快地对了“寿桃”，得到了老师的称赞和表扬。这一表扬对我影响不小，直到后来进了中学，我自己一直在学“对课”，初步懂得了格律诗中的对仗。记得中学毕业的那一年，一位姓徐的同学和一位姓柳的姑娘结婚，邀我去吃喜酒。在“闹新房”的时候，我即席作了一副对子：“昔传城北徐公美，今说河东柳氏贤”，大家都说对得工。这事后来给我的国文老师谢迺绩先生知道了，也说：把柳氏“悍”改作柳氏“贤”，改得好。

在“正蒙”小学念了一年半的样子，就退了学，这是母亲决定的。我吵闹了一阵，也没有结果。和我差不多年龄的表兄弟，他们穿得好，吃得好，有新的书包，有白铜墨盒、铅笔，而我则一无所有，不免有点羡慕，或者感到自卑，这种心理可能也被母亲察觉到了。不上学了，母亲就叫我“自修”，家里有一本破旧的

《幼学琼林》，就要我自己读，同时还亲自教我打算盘，但她也只能教我学加减，乘除她自己也不会。余下的时间，就帮着做些农活，那时还有几亩旱地，种点油菜、蚕豆、苎麻之类，我能做的也不过是松土、拔草之类。记得有一次春旱，雇了两个短工车水，我想试一试，结果被水车的踏脚打伤了左腿，肿了几天，也就没有事了。

我九岁，沪杭铁路的杭嘉（兴）段通车，艮山门是从杭州到上海的第一站，通车的那一天，整个杭州——包括沿路乡村都轰动了，我母亲也很高兴地带了二姊、四姊和我，背了条长板凳，带了干粮（南瓜团子），走了两里多路，到艮山门车站附近沿线的空地，排着队去看火车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沿线挤满了人，连快要收割的络麻地也踏平了。在盛夏的烈日下晒了两个多钟头，好容易看到一列火车从北面开来，隆隆的车轮声和人们的呼喊声溶成一片。这个大场面，尽管事隔七十多年，到现在依旧是记忆犹新。

过了年，母亲送我到德清去读书，我进了德清县立高等小学，走读，住在舅父家里。这是一所比较正规的学校，有学生五、六十人，校址是在孩儿桥北，明伦堂左侧。我在这里念了三年半书，到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夏季毕业。在学校里，我谨言慎行，算是一个好学生，毕业考试名列第二。我高小毕业，回到杭州，正是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年。尽管那时还小，可是在乡下，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因为在小学的时候，就听老师和同学讲过日本明治维新和光绪变法的故事，欧战开始之后，日本借口向德国宣战，很快就在山东登陆，占领了青岛。这样，连我也觉得亡国之痛就在目前了。

一九一四年这一年，我想用“穷愁潦倒”这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处境是恰当的。穷，已经到了几乎断炊的程度，连母亲的几件“出客”衣服和一床备用的丝棉被也当掉了。可愁的事，当然更多